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7.03.008

# 官场小说叙事伦理的建构

## ——以王跃文《国画》为例

张 石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官场小说”更多接续的是通俗文学的资源,但这种运用平民视角的叙述方式又导致了“官场小说”叙事伦理上的紧张。由于丧失了过去和未来的维度,《国画》等系列官场小说,着眼于在“1970 年代末期”即改革开放以来官场游戏规则“猎奇式”的揭示,始终无法树立起正面的人物形象。《国画》中强调的“人”和“人性”,于叙事中被逐渐发掘,人和官场的关系,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发生互动。

[关键词]《国画》;官场小说;叙事伦理;官场游戏规则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3-0041-05

###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Ethics in the Officialdom Novels: Taking Wang Yuewen’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as an Example

ZHANG Sh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fficialdom novels” continue more of the popular literature, but the narrative style of civilian perspective has led to the tension of narrative ethics. Due to the loss of the past and future dimens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and other series of officialdom novels, focusing on revealing the rules of officialdom games in a “seeking novelty” way since the end of 1970s wh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tarted, have always been unable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character image. The emphasis on “people” and “human n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s gradually explored in the narrativ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officialdom also interac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officialdom novels; narrative ethics; rules of officialdom games

一般认为,有官的地方,就存在官场。官场中值得关注同时覆盖于整个官场小说文本结构的,是继承传统而来的官本位意识。尽管这种官僚本位和现代的官僚系统会存在裂痕,但却无可厚非地成为了官场小说文本的基本立足点。王跃文的《国画》也并无例外。《国画》似乎通过荆都市的权力斗争暗示我们,官本位背后的资本本位,是真正操纵官场伦理的幕后魔王。整个荆都的官场结构也由几个资本集团构成,这些资本控制着官场内部的

生态系统更迭和官员的升降。大的权力背景之外,《国画》展现的官场之外的诸多内容往往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官员在官场外的情色生活、酒肉生活、荤段笑话和个人活动构成了与小说官场平行的另一个生活空间,这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官场小说打出的旗号是“为老百姓”,而不是从五四传承而来的“为人生”或者“为艺术”。这样的一种立意和尝试,给了官场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中的一股强大力量占据

巨大消费市场的可能性。“五四”以来,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博弈的一部分就是争夺读者群和消费阵地。当下青黄不接的“雅文学”与通俗文学进行竞争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作家在叙事的过程中,自然要选择合适的角度,读者想看什么小说是通俗作家们首先选择的角度,而作家要写作何种作品是雅文学作家首先考虑的角度。

所以我们发现,以王跃文为代表的一系列官场小说作家们做出的尝试是,通过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里面琐碎的生活进行描摹,达到一个能够和普通人民的生活以及阅读习惯接轨的目的。这里面不仅仅有权力系统顶端的运筹帷幄,同样有平行于官场的市民视角。在市民视角的写作中,体现出来的依旧是官场之外的人情世故里面折射出的官场内部风景。小说作家们选择什么样的叙事手段和叙事伦理,值得我们关注。

《金瓶梅》《水浒传》被旧道德认为是诲淫诲盗的,其所谓诲淫诲盗的叙事伦理是我们都已经熟稔的,而海官的小说却在并不被硬性约束的自由环境下风光无限。有研究者看到,这种伦理是一种“不讲政治原则的、以实利性为核心”的官场行为准则。在诸多官场小说中,我们看到许多从表达方式到言说内容都多样化的小说叙事伦理,而这种伦理的表现,往往是赤裸裸不加任何掩饰的。首先,暴露的就是最具批判性的;其次,直白的就是最具震撼性的。在官场小说《陈宗辉的故事》中,冯勤生总结说:“官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sup>[2]</sup>这种结论的揭示就好像色情小说里面直白爱情没有情感只有性欲一样,但是官场小说的作者们对此却乐此不疲。朱怀镜在《国画》中即扮演了这种角色,于是我们看到朱怀镜在做着两种努力:首先是不断地和玉琴和香妹敞开心扉,用最直露的方式讲述官场伦理;其次,用旁白和类似古希腊戏剧歌队的形式进行官场心理的揭发,表面上看似不动声色,实际上却是最严厉的揭示。在得知自己被提拔后,朱怀镜去拜访柳秘书长,在柳秘书长的家里,两个人都摆出“等”的姿态:柳秘书长的眼睛始终瞄着天花板,等着朱怀镜的例行公事;朱怀镜的眼睛始终盯着柳秘书长的眼睛,等待着柳秘书长的下一个动作的指示。这次拜访的实际性内容只有两三句话,朱怀镜心里清楚得很:“他知道,柳秘书长说的是组织上要提拔他,而他要说的当然不能说感谢组织信任,而要说感谢柳秘书长栽培。”<sup>[1]210</sup>在心灵史的写作中,这些

似乎是并不必要的内容,一旦进入到官场小说的叙事,就成为了必要。

我们认为,阅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或者说文学作品的倾向性的接受,一般基于两个方向:一是所有人都能够接触和达到的,二是具有传奇色彩、常人不能企及的。正如同样通俗的《水浒传》中,两个常常最受欢迎的人物林冲和武松,他们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追捧,是因为我们从林冲身上看到自己,而从武松身上看到了英雄。《国画》叙事伦理的选择,就是因为它使阅读者们对官场产生了无限的想象。在阅读中,我们可以被激发起原本潜藏在心中的欲望,这种人格中本来就具备的欲望,在这种叙事伦理的激发下,被拉扯到了可以被讨论其可能性的层面。原本英雄本位的人物形象,就被换置成为了大众本位,也因此,《国画》中的准正面形象,无法成为英雄,这种写法给了广大读者无尽的快感。快感之后,大家对这样的叙事伦理接受得心安理得。

在叙事伦理的强烈塑造下,欲望书写通过官场的客观形式得以表达,那么,在官场所构建的世界里面,往往实现欲望的一种状态和呈现方式就是“等”。朱怀镜在“发迹”之前,是很少让“等”这个词主动进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但一旦进入到地方权力中心,“等”就作为一种艺术配合着欲望进行朱怀镜官场人格的塑造。朱怀镜第一次被派出所所长宋达清当做贵人对待并受邀饭局的时候,出于多年的官场观察和本能,朱怀镜的第一反应就是等,并马上赋予“等”以最高规格的官场催化剂的作用。在王跃文的其他官场作品包括《梅次故事》《苍黄》等诸多小说里,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个断片式的场景同样是“等”。小说主人公的总体形态其实也可以用“等”来形容:官员都在等待一个升职的机会,都在等一个看似美好、值得等待的东西迎面过来,等待哪一天好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们日常的姿态也是“等”:官员们在等下班,下班后或者等人吃饭,等车子来接,或者等待晚上与情妇的约会。朱怀镜在平步青云的过程之中,学到重要的一环就是等,如果没有“等”,那么官场就不能称之为官场了,也就是朱怀镜常常教育李明溪所说的,你们不在官场,不懂。官场的的世界里面存在着一个畸形的戈多,《国画》里荆都大大小小的一派官员们都打着伞,在官场里面穿着欲望的外衣永远在等待着。

同样在等的,也有曾俚和李明溪们。小说中,

曾惺作为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他们在等待但又注定始终无法掌握叙事的话语权。时代,成为掌控小说节奏的重要角色,这在许多对官场小说的定义中可以清晰地得到印证。有的研究者这样定义官场小说:“侧重表现 1970 年代末期以来国家公共权力结构中的人情世态,其中既包括这些题材领域中具体的权力运作、人事往来,也包括公共权力对官场中‘人’的精神渗透所造成的心灵景观,并着重强调他们都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sup>[3]</sup>而这一定义,也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认可;这种高度认可背后,实际上趋向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认同。“1970 年代末期”的时间点,非常明显地将官场小说的定位在改革开放这一跨时代的时间点,显得异常敏感。而空间上,人的心灵景观成为诸多官场小说作家针对的方向,这种看上去直露的批判式的写作,实际上暗涌着心灵史书写的共通维度。从两个维度考量官场小说在八九十年代的活跃,也可以发现时代所赋予的独特内涵以及这种内涵在小说中的重生或者磨灭。

20 世纪 80 年代的记者作为让人感到神圣和正义的职业,在《国画》里面直接被一个巨大的官场伦理系统排斥,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职业的真空化甚至完全消失。利益得失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之下渗透进不同职业之间;不同职业既会由于利益矛盾相互排斥,也会由于利益的趋同而产生一定程度的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官场小说文本中的诸多形象都开始有意无意地向“理性人”的方向靠拢。曾惺所代表的一批正统的、老派的知识分子,已经很难在文本中立足。这样,我们发现的可作为“正面人物”或“准正面人物”的形象无法站立起来,同时无法成为英雄。

作为对照,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中——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改编电视剧——我们发现,在文本里面存在着一对相对鲜明的关系,就是正和反的对立,这种官场的对立直接给出了价值判断。从进入到文本开始,这种扁平人物就以一种不变的姿态保持在读者面前。也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正面人物站得越来越高,反面人物掉得越来越深。于是,在这种正面形象得以树立起来的塑造中我们发现,阅读一种非常纯粹的官场读物,以绝对“官场”作为小说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这一类官场小说的特点。

相反,《国画》中的“正面人物”则很难能够“立

起来”。官场与非官场本来就形成两个自然的平行空间,同一人物可以同时涉足两个空间,两个空间内的同一角色也可能扮演着正、反两个方面。一般作者在处理人物身份的时候带有褒贬,而恰恰是这种带有明显褒贬意味的作品,似乎少了春秋笔法一样的韵味。《国画》与一般官场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看不到一个好人,同样看不到一个坏人。换言之,文本中的所有人物都有着他们作为“人”的生命力,这是作者在描绘官场中的官的时候非常注重的前提。“正面人物”不明显或者说不存在,就给小说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一定的模糊。官场中的官也是人,他们自然具备着一个人所应有的人格,只不过在官场内、外会产生一定差别的伦理倾向,而这种倾向也并非作为个体的人所能够全部承担的。从《国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腐败的根源不在个体腐蚀,而是体系腐坏,所以单纯的道德指责往往显得单薄。而《国画》也在不断地提醒着读者,我们既要看到个体权欲在不断膨胀,同时也需理解和拷问,这种个体的主体性缺失是基于何种条件产生的。尽管我们看到《国画》中描写了大量的行贿受贿,但是这些似乎并非在进行一种反腐主题的呈现,腐败问题表现得并不是那么鲜明。与之呼应的是腐败所带来的人性的扭曲,这是作者在写作时更看重也更愿意去超越反腐深度挖掘的主题。《国画》的特殊之处在于,从官场中来,却没有到官场中去,作者试图在一个细微的官场系统里面,展现出宏大的人心图景。

曾惺和李明溪,甚至卜老先生这种带着仙风道骨的人,是《国画》中大概可以分化出来的“准正面人物”,这些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卜老先生是李明溪的忘年之交,两人有相见恨晚之情,但仔细考量,卜老先生实际上并非是一代宗师式的人物,卜老先生最大的标签是他的年龄。80 余岁的年纪给他人带来的首先是关于年龄的敬畏,其次才逐渐进入到学问层面的探讨。而关于卜老先生的身世家庭,小说也略有提及,他同样不是显贵的知识分子大师——或许这也是王跃文对于纯粹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低调的反向的尊敬。卜老先生这类人物的出现也并非意义肤浅,而是带着一种历史性和仪式性的象征意味。老人的出现在整个叙事结构中产生一种分裂,这种叙事直接把时间和空间分成了两套甚至三套平行结构,过去和历史开始大胆地进入到文本中来。如有可能,未来

时间也会加入到里面。从语言到具体的意象,我们都开始从《国画》里面找到了清晰的历史指向。在八九十年代的官场伦理中,人际关系的维持往往需要某种中间物,这种类似媒介的东西往往用书画作品来充当,这也是《国画》与现时代接轨的一种尝试。李明溪创作的国画为什么不能价值连城,老先生眼光独具看到了李明溪作品的闪光之处,李明溪的作品就进入到了艺术的境界;而朱怀镜永远看不到艺术,所以他又通过几次拜访行为,将“艺术”行为强行拉回到“官场”行为之中。卜老先生的作用,也就在于不断加强这种官场叙事伦理的塑造。在《国画》中,官场中人找寻官场的答案或者“超越官场”的行为,可以从朱怀镜与卜老先生的对话、李明溪与卜老先生的对话中找到,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关于未来的叙事中找到蛛丝马迹。但是唯独不能够达成的就是在现时态的现实中完成这种超脱。现时态一直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时态,这个问题在这类的官场小说中被一再地强调,但一直难以通过作家的想象解决。

朱怀镜对于卜老先生和李明溪的评价是“这一老一少,真是迂得可爱”,<sup>[1]446</sup>而卜老先生也不断引发朱怀镜对于官场学问的领悟。朱怀镜说“荆山的地价今年又涨了,真是寸土寸金,不是一般有钱人有钱去买的”,<sup>[1]336</sup>不过卜老先生开的雅致堂日进斗金,生计问题从来不是值得发愁的,就算如此,卜老先生还是要用中国文人一贯的自嘲来讲自己穷得要捡榆钱儿。朱怀镜看到的是卜老先生关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二律背反”,而李明溪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更加朴素,他只看到了卜老先生打油诗的“我辈只啖风与月”,从来没有想过他提到过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也并非穷困潦倒。

在朱怀镜和卜老先生的交流中,似乎形成了另一套微型的官场系统。这一套官场系统里面,折射出历史的光芒。在这道微光中,我们可以观照到,一个传统历史中的传统文人在当代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生存方式。朱怀镜找到卜老先生是为了实现官场伦理的外在彰显,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这种忘年交也正是卜老先生心中潜在的欲望。这种原本已经蜷缩在传统中的人际关系突然被现实中的官场伦理点亮,卜老先生这样一个旧派非典型性知识分子自然显得异常激动。他高兴的是不仅仅看到了世上还有李明溪这样精通传统伦理之人,他还看到了朱怀镜带来的关于新旧伦理产生交融的可

能性。

同时期的官场小说《狗日的前程》中有这样的表述:“人进了官场,就身不由己地要去搏一搏、拼一拼,天知道拼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他想起了农贸市场上的螃蟹争先恐后往篓口爬,互相践踏,互相牵扯,很少有杀出重围的。有幸杀出来的,也已经断胳膊断腿,却又被主人扔回篓子里。”<sup>[4]</sup>这一关于螃蟹的比喻十分精彩,也可以说是官场这个框架内所体现出来的宿命一般的运行逻辑的坦白。在这样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了人的主体精神的缺失。

我们会常常看到这样的描述:我们官场、人在官场、你们官场,这种表达方式就传达出来一种信息,似乎官场不再是作为独立人格和独立主体的他者,主体精神已经在这个场域里面消亡了。

《欲望之路》中邓一群用“罪不在己,而在社会”来自我安慰,叙事者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将小说人物以及小说主人公的个人主体精神的沦丧归结到了社会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进行怪罪和埋怨的地方,只要个人出现了一点点不如意,那么一定不是个人能力造成的,一定是社会不公、社会黑暗来背锅。所以,在叙事者这种叙事伦理的引导下,个体的主体精神虽然大面积缺失,但是流失的个体、逃避的精神也得到了一个灵肉安置之处,可以规避所有道德审视和道德追问。

市场和资本的时代规则指引下,主体精神在官场小说里面丧失的是官场人选择的自由,他们无法进行心灵的自主选择,能够做到的只有向权力和资本屈服,没有原则地追逐权力的交换价值。正如前文所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国画》中,权力新贵朱怀镜的背后,市长皮德求的背后,包括江湖术士袁小奇的背后,都有或大或小的资本支撑,后来他们有的继续飞黄腾达,有的一蹶不振,原因也就在于背后资本集团的兴衰起落。主体精神在这样的叙事环境下显出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关于道德的伦理的认知,实际上小说人物已经做得不能再好了,他们对于高尚的、崇高的所谓良知的认识,是超越了所有人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群人,恰恰丧失了与自我认识相匹配的道德精神。所以,在这样的叙事环境下,主体精神的世界里面就形成了强烈的张力。

约翰斯顿说:“我们的行为必须把人性本身,不管是自己的人性还是别人的人性,看成一种目的,

而永远不把它只看成一种手段。”<sup>[5]</sup>当然,这样的伦理选择看上去是没有道德错误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因为《国画》叙事伦理的这种不合理的强烈和不断地进行反主体精神的建构,最终达成的是叙事过程中的自足,叙事的合理性高于了伦理的合理性。

在这样的一种叙事伦理的指引之下,造成的伦理后果就是,《国画》的伦理尽管缺乏了自我批判和主体精神,但却具备另外一种倾向性即“诲官”。读者的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小说叙事的伦理倾向,而读者往往依赖于叙事“技巧”和叙事者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观”。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叙事者对于主人公的官场行为不会产生对与错的价值判断,反而对道德自律显示出了嘲讽的态度,小说中出现的具有道德自律的知识分子们让人觉得幼稚可笑。《国画》中的曾俚就是如此,朱怀镜对曾俚这样说:“现实已经如此,大凡遵从真理的人,都会像三岁小孩说大人话一样显得幼稚可笑,只是又比小孩少却了一份天真可爱。”<sup>[1]128</sup>其他官场小说作家的小说都有类似的描写,有人对身在官场的主人公说,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主人公一定会叹口气说——似乎所有的官场小说作家都达成了共识——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我自己也不清楚,就算是好人,又能怎么样呢?接下来就是自己对于官场、对于做官的个人化理解。虽说是个人化,但是在官场小说的叙事逻辑中是普遍性的。这种情景经常出现在主人公与情妇之间的对白之中,似乎只有在这样的比较私密的场景之中,才能说出真话,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好人以及我想做好人而不得的苦衷。做好人而不得,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官

是很危险的,做官就要承担做好人而不得的风险。小说一方面告诉我们如何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一方面又说官场里好人不多甚至没有,这样的叙事难免显露出不可兼而得之的尴尬。

官场小说的这种倾向性和潜在的启蒙性,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心理:既然我们无法从正规的教材、读本中得到做官的道理,那么我们似乎可以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打通。剥去叙事的伦理外衣,实际上我们再度发现了文本的海人功能。文本的海人性,是通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的就是俗。固然,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具有这样的功效,但是启蒙的出发点和官场小说这类通俗作品存在着差异。两种形式的启蒙者和民众的对等性是有裂缝的,而官场小说的作者往往通过文学的形式,试图实现相对平等的沟通。沟通的结果就是,官场的道理得以宣扬,官场的人格得以确立,双方对于权力的理解达成了共识。

#### 参考文献:

- [1] 王跃文. 国画[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2] 祁 智. 陈宗辉的故事[J]. 收获,1999(3):56.
- [3] 唐 欣. 权力镜像: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0.
- [4] 祁 智. 狗日的前程[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85.
- [5] 亨利·约翰斯顿. 论修辞学伦理[M]//大卫·宁. 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 常昌富,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2.

责任编辑:黄声波